

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

(一九五九年)

什么是共产主义，现在确实有好好学习和研究的必要。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人就应当正确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才能更好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作好准备。说起来似乎很奇怪，《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快四十年了，我们天天嘴上说共产主义，可是有不少人甚至于作了多年共产党员的人，却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例如去年曾经一度刮过的“共产风”，波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就表现了我们有不少人不懂得共产主义。这不是说今天在座的同志们都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想说，同志们是作文艺工作的，是一个伟大的宣传力量，今后向全国全党宣传什么是共产主义，在座的同志都是有责任的，为此目的而好好学习一下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的关系是一件大好事。

去年刮的“共产风”，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而是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东西，马克思把这种思潮叫做原始的共产主义。“共产风”实际上就是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初

* 本文是根据一九五九年的一个报告整理而成的，发表在《群众论丛》一九八〇年第一期，收入本书时，文字上作了校正。

期，在欧洲一度流行过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潮的中国形式，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绝对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要是我们把去年刮“共产风”的人有关分配方面的思想研究一下，就很容易看出古今中外的原始共产主义是何等相似。

有的人说，公社成立后，就是各取所需，要什么有什么，看电影、看病、坐汽车都不要钱，可以到处旅行，到处吃喝玩乐。

有的人说，共产主义使人们享受共同待遇，不分技术高低和劳动创造的财富多少，所以共产主义就是平均主义。还有比这种说法更进一步的：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有钱一律归公，孩子也是大家的。劳动的有吃有穿，不劳动的也有吃有穿，什么都是人人一份，什么也不分你的我的，都是一个样。

要是我们根据上述的片断材料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去年那一股“共产风”，实际上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之风，这不是实行共产主义，是在糟蹋共产主义。这些人不是把原始共产主义当作科学共产主义，就是把科学共产主义当作原始共产主义了。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写过一本书叫《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在这本书里，他对原始共产主义作了全面的论述，今天读起来，使人感到非常亲切。

马克思指出：原始共产主义实质上是私有制的普遍化，即普及到集体的每个成员那里的私有制的表现形式，就象牧放在草滩上的羊群一样，滩上生长的牧草每头羊都有一份。原始共产主义既然是以实现普遍化了的私有制来反对一般私有制，它势必要把一切不可能为每一个成员所私有的财富破坏掉。十八世纪末期法国的“平等派”就在自己的宣言中写道，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让一切工

藝都消滅吧！只要有平等就行了。他們所指的“一切工藝”，實質上是人類文明的成果，包括近代化的工業技術設備在內。此外，他們還要以強制的力量來否定人們才能上的差別。在他們看來，才能上的差別是分配上差別的決定因素。要是把這種思想一旦付諸實現，其後果是非常明顯的：他們要求人們平等地占有財富，結果是財富的消滅；他們為了實現分配的平等，而否定人們才能上的差別，可是只要人們的才能還存在着差別，分配上的不平等實質上是平等的表現形式。否定這種形式的平等，就把平等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結果是生產率下降，以至整個社會經濟破產。因此，恩格斯非常生動而深刻地把這種思潮叫做“狂暴的幻想”。

對社會財富實行平均主義的占有，並不能消滅私有制，恰恰相反，平均主義在這裡充當了徹底的私有制的形式。任何私有制思想都傾向於對他人私有權的妒忌，並要求和他人占有的財富處於平等地位。這種妒忌和平均化的要求，是構成私有者進行競爭的因素，也是小私有者對付比他較大的私有者的手段。原始共產主義不過是從妒忌和平均化的欲望出發，企圖給人們規定一個共同的、最低限度的占有財富標準的社會形式，去年刮“共產風”時，不是有人說，除去一只碗一双筷子其它都是公家的嗎！

用原始共產主義來消滅私有制，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倒退，倒退到尚未達到私有制的生產力水平的社會里去。在那裡，沒有任何文明與文化，只有一群貧困的、沒有理想的人，他們和物質世界的關係用近似於動物對物質世界的狀態表現出來。我很懷疑有些熱衷於刮“共產風”的人能否言行一致，真正願意去過他所说的“共產主義的生活”，因為馬克思還說過，原始共產主義不過是掛着公有制幌子的“私有制的卑鄙的一個表現形式”。

随着去年的“共产风”一齐而来的还有各种胡言乱语。这一些大概是他们“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吧！

有的人说，建成共产主义，只要人民觉悟提高就行了，不一定物质基础很丰富。

有的人说，进入共产主义，不是根据什么规律，而是谁说就算了。

这些同志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的，离开这个世界观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也找不到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在其早年著作《神圣家族》一书的第六章第三节中，在《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的题目下，曾经讲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马克思说：“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对此加以解释说：“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

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167页）马克思在这里集中地说明，根据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学说，应当合理地安排社会环境，使生活在其中的人“能认识到自己是人”，也就是经济上、政治上得到彻底解放的人。

二、人性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里占有突出的地位。这种学说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从这种学说出发，对法国社会进行改造的一次尝试。实践证明，按照法国唯物主义的社会观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仅仅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理想国，它和封建社会同样是一个“不合乎人性的东西”，不能使人“能认识到自己是人”。十九世纪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无非是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社会观出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设计自以为“合乎人性”的社会的蓝图。这些学说尽管是唯心史观的产物，但却有一定合理因素，所以恩格斯说，科学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谈谈傅立叶和布朗基两位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三、傅立叶对法国唯物主义作过尖锐的批判，但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则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的”。傅立叶认为革命后的法国，富人步步高升，穷人依然贫困，这种社会荒谬绝伦，是违反人性的东西。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嘲笑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文明的预言

的破产。他宣布这个哲学完全无能，是不值得相信的。应当注意的是，傅立叶在这里并没有反对法国唯物主义者建立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的愿望，他批评的仅仅是这个哲学无力消灭贫困，为人民安排一个如他们所期望的“真正合乎人性”的社会。他宣布这个哲学不可相信，但他并不怀疑这个哲学所主张的人类社会能够趋向完善的信念。总之，傅立叶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评，不是反对它的基本原则，而是批评它无力指出实现这样原则的道路。正因为傅立叶和法国唯物主义者具有共同的原则和信念，所以他才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者的面目出现，为重新建立“真正合乎人性”的社会献出了他的一生。不过他除去留下自己的著作，供后人批判、吸取外，对现实并未发生任何影响。

傅立叶是社会改革者，但在实践上他反对阶级斗争，宣传阶级调和，把改变无产者的命运的任务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但不容否认，傅立叶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并对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还认识得相当深刻。他不只是看出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还进一步承认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决定着当前的重要事件。他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上，制订了以阶级调和为手段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策略，听起来象是奇谈，但事实确实如此。

布朗基是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另一个流派，他主张“真正的平等”，即人人占有财产的平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布朗基不仅不反对阶级斗争，反而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为了夺取政权，他在玩弄军事阴谋、流放、牢狱中渡过了一事无成的一生。作为阶级斗争论的狂热的实践者——布朗基所犯的 error，并不比阶级斗争调和论者傅立叶所犯的 error 少一点，因为这两种不同的策略都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理性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不同的表现形式。

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它对自然界的观察是唯物主义的，对社会历史的观察则是唯心主义的。因此，在解决人的性格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时，唯心主义的观点就立即暴露出来了。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性格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这样的观点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接近，然而当他们达到这样水平时就停止下来，并进而走向历史唯心主义。因为既然社会环境决定人的性格，那末，又是什么力量决定社会环境呢？法国唯物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贯彻唯物主义路线，反而倒向唯心主义，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理性支配着世界”，社会环境的状况又是为理性决定的。只要承认这样的历史观点，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是经济关系的产物，而是从属于理性，它可以按照理性的要求，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来解决。因此承认阶级斗争存在的傅立叶，以阶级斗争调和论的面目出现，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至于布朗基所以成为阶级斗争论的狂热的实践者，同样因为他是“理性支配着世界”学说的信徒，按照这样的学说，当权者可以用立法的手段，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社会，以至改变每个公民的精神面貌。

我们给这种社会主义加上空想二字，并无恶意，任何社会思想当它不是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而是根据这样或那样的原则去设计改造社会的蓝图时，它必然是空想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如此，去年我们那些热衷于刮“共产风”的同志又何尝不是这样。曾见有这样个县，把全县人口穿的鞋子包下来，搞穿鞋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可是本县生产的鞋子没有这样多，只有派人到外地花钱去买。这种穿鞋不花钱的“共产主义”，还是花钱买来的。“吾谁欺，欺天乎！”“美好的社会早日来到吧！同过幸福的日子吧！”听起来很动听，然而到底它在哪一天来到，这要取决于我们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水平，而不是“赶快下命令”进入共产主义，“谁说了算”所能办得到的。老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乞灵于资本家的善心，拿破仑的权力，布朗基相信过法律的强制力量，结果都一事无成。我们的同志应当记住这样的历史教训。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马克思严格地依据历史和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来论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正如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发展底经济法则引伸出来的。”（《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1953年版，第38页）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根据恩格斯上述的见解，我们并不反对理性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我们所要反对的是那种不是“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的，而是从头脑中推论出来的理性，靠这样的理性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会弄出“弊病”来的。我希

望热衷于刮“共产风”的同志接受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教训，把唯物主义的理论、路线贯彻到底。在这里，不只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也有辩证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斗争，离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前进的道路上要迷路的。因此之故，斯大林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

从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这样一种概念，就是：科学共产主义既然是直接从科学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得出来的结论，那么，我们对于一切有关共产主义的问题，就必须抱科学的态度，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进行研究，任何时候在这个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都是要犯错误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只有这样，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才是科学的、坚定的。

去年刮了一阵“共产风”，确实给我们的工作以很大的损害，在此情况下，可能有人以为搞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错了。“共产风”刮了一阵，并不能说不应当搞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恰恰是说明离开辩证唯物主义是要犯错误的。人民公社本来是集体所有制，这样的所有制是和我们现实的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合的。如果在公社成立后，谨慎行事，现在的情况会好得多。可是有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急急忙忙地宣布改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又急急忙忙地宣布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这就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不同的社会阶段，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的。

要弄清这些道理，必须读一下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有关部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已经在自身基础上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21页）列宁在解释上述的话时说：“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1页）我们那些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同志就是不懂得人民在各方面都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这个特点。他们更不懂得这个特点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决定，不是靠哪一个头脑中设想出来的原则能解决得了的。如：这不要钱，那也不要钱，实行全部供给制，把人民的生活全包下来，实际上是包不了的。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页）马克思认为，人类只能解决已经具有解决条件的任务，可是去年有人却特别反对所谓的“条件论”，这实际上是陷入了唯心主义。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说：“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

构’种种定义，也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7页）

去年刮“共产风”的时候，我们有些同志把共产主义看成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不分析我们经济上成熟的程度，不考虑物质基础，凭脑子一热，凭主观愿望，嘴一张，以为说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不是唯心主义是什么？

去年在讨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也暴露了某些人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上，资产阶级法权或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有人却在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上大作文章。列宁说：“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同上书，第457—458页）列宁还说：“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资产阶级的’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刚从资本主义腹内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同上书，第458页）

资产阶级法权或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还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可避免的东西，就是说，还是必然的，亦即必须如此的。必须如此而偏不如此，硬要空口去否定它，这就不是唯物地、辩证地去对待问题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认识它，承认它，准备充分条件去克服它。机械唯物主义者认为人是不自由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又讲什么自由意志，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前者只知必然，不知自由，后者只知自由，不知必然，他们都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去对待自由与必然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者则是

辩证地、唯物主义地对待这个问题，认为自由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人认识了必然就自由了，而不是回避必然获得自由。既然是必然的东西，主观上想回避它，事实上是回避不了的。农村取消工分制，工厂取消计件工资，事实证明是有问题的。

我们在现阶段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强调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批判“三风五气”、雇佣观点、名誉地位观念、争权夺利思想等等低级趣味的东西。只是批评那种片面强调物质利益刺激而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观点，并不是根本否认物质利益的原则，否定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在现阶段否定资产阶级法权，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在现阶段否定按劳分配原则，那就要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合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有些地方否定按劳分配带来的苦果，我们是已经尝到了的。

我们有这样的同志，当强调政治思想工作时，就否定物质利益的原则，当注意物质利益的原则时，就忽视政治思想工作，他们总是喜欢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去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说到最后，去年刮“共产风”也就是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风。

去年刮“共产风”时，某些地方对生活资料的处理，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共产党宣言》上说得明明白白：“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财产所有权，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22页）

“我们根本不打算消灭这种对于直接供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物的个人占有，因为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东西来替什么人造成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力。”（同上书，第23页）

去年刮“共产风”的时候，有些人认为，除了老婆以外，或者说除了一双筷子一个饭碗以外，其它一概归公，就是“共产主义”。这样的“共产主义”比起老空想社会主义来还要等而下之，因为不管傅立叶等人的社会主义有多大的空想的错误，他们还是为消灭贫困而努力的。再者，我们在土地改革时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富农多余的土地，对私人工商业还采取了赎买政策，就是对西藏未参加叛乱活动的上层农奴主也还是实行了赎买政策，为什么劳动人民的生活资料要归公呢？

这又说明了正确地宣传共产主义何等重要，《共产党宣言》这种关于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非读不可。在有些人心目中，似乎对这本书连个印象都没有。

共产主义的大师们对待科学共产主义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严格地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去对待的。例如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如何具体过渡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的时候，还没有具备解决这问题的条件，他们就老老实实不谈这个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有这样一段话，很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列宁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地发展，将怎样迅速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至于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5页）

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对于如何对

待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完全适用的，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能够肯定回答的是，这个过渡决定于生产发展的水平，至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何解决，历史向我们提供的材料还是很少的。当客观上不具备解决问题的条件，勉强去解决，就只有靠想象去制订方案，这种看起来貌似前进的东西，常常是历史的回声，我们不是从“共产风”里找到了十八世纪末期和十九世纪初期在欧洲一度流行过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影子吗？

这样理解列宁的话，是不是给热心于共产主义的人泼冷水呢？不是的。因为列宁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虽然不可能预料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形式等等，但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给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准备好了条件，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够为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提供物质基础。一切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都必须首先热心于积极地、老老实实在地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为全国的高度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努力奋斗。科学共产主义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产生出来的，它对每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要求必然如此，也只有具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才会坚定地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